

# 跨文化视域下《诗经》植物意象翻译的对比研究

## ——以《蒹葭》为例

冯 果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2日

### 摘 要

本文聚焦于跨文化视域下的《诗经》植物意象翻译, 明确《诗经》植物意象分类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异化、归化及融合三种翻译策略的适用场景、实践效果与优劣得失, 以《蒹葭》为具体案例, 通过系统对比许渊冲、杨宪益和戴乃迭、汪榕培、詹姆士·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高本汉(B.J. Karlgren)七位译者对《蒹葭》中“蒹葭”这一植物意象的六种英译版本, 深入剖析跨文化翻译中植物意象传递的方式、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语言特性与译者个体因素, 揭示跨文化视域下《诗经》植物意象翻译的复杂性 with 规律性, 探讨合适的翻译策略, 以促进《诗经》文化内涵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传播。

### 关键词

《诗经》, 《蒹葭》, 植物意象, 跨文化, 翻译对比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Plant Imagery in the Book of Song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A Case Study of Jianjia

Guo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March 31,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2, 2026

## Abstract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plant imagery in *The Book of Song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plant imagery in the work,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applicable scenarios, practical effec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re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and their integration. Taking *Jianjia* (Reeds) as a specific case, through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six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plant imagery “*Jianjia*” translated by seven translators—Xu Yuanchong, Yang Xianyi & Dai Naidie, Wang Rongpei, James Legge, Arthur Waley and Bernhard Karlgren—it deeply analyzes the modes and differences in conveying plant imagery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cultural roots,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individual translator factors. Furthermore, it reveals the complexity and regularity of translating plant imagery in *The Book of Song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Book of Songs*.

## Keywords

*The Book of Songs*, *Jianjia*, Plant Imager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世界文化交流愈发频繁的当下,《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瑰宝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收录的305首诗篇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提及植物的多达135首,涵盖106种植物[1],这些植物意象承载特定文化内涵,且多延续至今成为典型文化意象。在《诗经》英译研究上,我国《诗经》本土英译本研究向来薄弱。对此,李娟总结道,“历史短、规模小、强度小、影响小是《诗经》翻译研究的总特点”[2]。而国外学者起步较早,各译本相继问世,异彩纷呈[3]。其中自庞德的《诗经》译本自始至终主张全面意象化的策略,融入意象主义诗学并在英语文学中崭露头角,成为意象主义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4]。从此,《诗经》译本中的植物、光、声音和动作等各类意象成为新研究热点,推动《诗经》意象研究从薄弱走向多维度深化态势。近年来,《诗经》翻译研究仍是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研究视角日趋多元,生态翻译学、概念整合理论、阐释学翻译理论等先后被引入,分别从多维转换、认知机制、历史语境等层面为《蒹葭》等经典篇目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语料库与CiteSpace等方法的运用,也推动研究从微观文本对比走向宏观态势梳理。与此同时,围绕《诗经》英译的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徐茜源、尹明明以文明互鉴为视角,依托“三美论”探讨许渊冲译本对民俗文化的美学处理与传播效能[5];高远、李崇月以翻译适应选择论解析许渊冲的译者行为,拓宽了《诗经》翻译的研究路径[6];胡作友、冯悦则从诗学与译者主体性出发,指出翻译是二者辩证互动的过程,译者需在能动性 with 受动性之间把握尺度,在动态调适中趋近源语诗学[7]。既往研究虽已取得诸多成果,但在跨文化传播中,因文化和语言差异,《诗经》植物意象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常常出现意义流失或变形等复杂情况仍值得关注,且目前跨文化翻译的复杂性也是相关领域研究热点之一。鉴于此,本文选取流传广泛且具有典型植物意象的《蒹葭》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法、对比分析法和跨文化研究方法,对不同翻译版本中《蒹葭》植物意象的呈现展开

深入分析,旨在揭示跨文化翻译的复杂性,为准确传达《诗经》文化精髓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助力中国古典文学在国际上有效交流与传播。

## 2. 跨文化视域下《诗经》植物意象翻译

事实上,在中国古典诗学领域,意象占据着重要地位。回溯发展历程,南北朝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明确提出“意象”概念,书中提到“窥意象而运斤”[8],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文心雕龙》也完备其内涵,指出意象是融合诗人主观情志、意象依存的文学创作元素,在审美表现、表意以及内部构成关系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特点与内涵。而后,皎然提出“象下之意”细化意象内涵,唐代诗人与诗评家达成共识,认同意象是融合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且二者存在寄托关系这一内涵[9]。简言之,意象就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复合体,它不仅是中国诗歌的情感载体,也是诗歌表达意境的关键手段。植物意象是古诗词中的常见意象,是意象的一种特定类型,目前学术界还尚未有对其明确的概念界定。石明翰浏览大量相关学术论文并发现“植物意象”在中国诗歌中大致可分为“植物类意象”和“植物的意象”[10]。前者是指植物以其本身的形态、色彩、生长习性等自然属性呈现而具有其特定隐喻含义,诗人通过对这些自然特征的描写,抒发特定的情感,塑造特定的性格特点,比如“梅”这一意象,因其耐寒、开放早的特点来表达孤高、不同流合污、敢为人先的诸如优良品格;后者是指植物意象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现实需要被赋予了由本身引申出的特定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诗人借助这些具有文化内涵的植物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志向和价值观。例如在南朝乐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中,借“莲”,谐音“怜”来象征爱情。由此可见,意象、语言与文化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正如廖七一所言,“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载体,必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语言塑造的意象也必然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心理结构、宗教习俗、价值观念以及历史和地域的特征,故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也必然涉及到英汉意象的转换”[11]。这一观点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所倡导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理念不谋而合,即文化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12],进一步凸显了意象在跨语言、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因素对其的深刻影响。基于意象与文化联系及自身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呈现形式,其不同文化语境中与源语文化密切相关,跨文化传播会因差异产生不同理解接受情况。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也探讨过不同文化背景下读者对同一意象的解读往往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影响翻译的策略选择以及作品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效果[13]。这就要求译者必须重视这种关联性,充分考量理解差异,以准确传递意象内涵、实现文化有效沟通。

## 3. 《诗经》植物意象翻译的对比研究——以《蒹葭》为例

### 3.1. 《蒹葭》原文分析

《蒹葭》是一首表达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爱情诗,开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深秋的景象,“蒹葭”即初生的芦苇,茎秆纤细、中空,叶片狭长,喜水湿,多生长于水边[14],其中的“蒹(jiān)”指的是像芦苇的荻,葭(jiā)指的是芦苇[15]。那生长在河边、摇曳的芦苇,在深秋清晨的霜露笼罩下,本身就有一种若隐若现、缥缈萧瑟的视觉效果。诗中,“蒹葭”不仅是自然景物,更是情感的寄托和象征,与诗歌的主题和氛围紧密相连,全诗通过对“蒹葭”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状态下的描写,为诗歌奠定了一种如梦似幻、迷离恍惚的基调,象征着主人公对伊人的追求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阻碍和求而不得的神秘感和惆怅之情。

除了植物意象“蒹葭”的成功营造,《蒹葭》还具备多重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意境营造上,全诗以蒹葭、白露、秋水、道路等自然景象与环境为笔墨,将深秋时节的苍茫芦苇、凝霜白露与浩渺秋水交织,勾

勒出一幅朦胧画卷，主人公追寻“伊人”时的惆怅心绪与这一景象深度交融，完美实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让读者能直观感受到诗中那份悠远又感伤的氛围。在韵律表现上，诗歌采用《诗经》经典的四言句式，句式整齐划一，节奏明快舒缓，读来朗朗上口；同时，诗中巧妙运用“苍苍”“萋萋”“采采”等叠词，搭配叠韵、双声的语言技巧，不仅让文字本身更具韵律感，更赋予诗歌悠扬婉转的音乐美，增强了朗诵时的感染力[16]。而重章叠句的手法更是《蒹葭》艺术表达的重要亮点，全诗三章结构高度相似，核心句式重复出现，仅在关键字词上稍作变化——如描写白露状态的“霜”“晞”“已”，刻画道路特点的“长”“跻”“右”，以及指代水中陆地的“中央”“中坻”“中沚”，这些细微变化既避免了重复的单调感，又形成了回环往复的节奏，随着章节推进，主人公追寻的难度逐渐增加，内心的执着与惆怅也层层深化，让情感表达更富层次感。此外，诗歌的情感传递还兼具含蓄蕴藉之美，全诗未直接倾诉主人公对“伊人”的思念与求而不得的怅惘，而是通过对自然景象的描摹与追寻过程的叙述，将情感隐于文字背后，留给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让不同读者能从诗中读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共鸣，赋予诗歌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 3.2. 跨文化视域下《诗经》植物意象翻译的策略探讨

通过比较这七位译者对《蒹葭》植物意象的翻译，可以明显看出，由于其所处文化语境及受众接受习惯等因素影响，他们在翻译中会权衡使用异化或归化等不同策略。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内涵最初是由德国的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 Schleiermacher 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到：“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1995年，美国翻译学家 Venuti 受 Schleiermacher 的影响，明确地将 Schleiermacher 的第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Foreignization)，将其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on)，即前者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最大限度保存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后者则是“遵守目标语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17]，借助译入语(英语)中的文化负载词，尝试将原诗中的意象融入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框架之中，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与接受度。(见表 1)

Table 1. Plant imagery of *Jianjia*

表 1. 《蒹葭》植物意象表

植物意象	翻译者	译文
蒹葭	许渊冲	the reed
	杨宪益、戴乃迭	the reeds
	汪榕培	green reeds
	詹姆士·理雅各(James Legge)	the reeds and rushes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the rush leaves
	高本汉(Klas B.J. Karlgren)	the reeds and rushes

#### 3.2.1. 异化策略

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翻译理念核心是“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他认为，翻译诗歌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还要保留诗歌的意境、韵律与形式之美，使译文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艺术魅力[18]。因此，凭借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深厚情感，许渊冲在意象选择与翻译策略运用上侧重凸显文化特色，贴合本土视角下现代人的理解与文化认同，让《蒹葭》在跨文化传播时既保留中华传统文化韵味，又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提供多元解读可能。为达“意美”，他精心选取“the reed”来对应“蒹

葭”，借其体现主体形象并结合韵律营造，还原原诗朦胧、悠远且饱含深情的意境。同时，在“音美、形美”上发力，以诗译诗，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形式上整齐美观，充分展现古典诗歌韵味，助国外读者领略传统文化之美。詹姆士·理雅各主张翻译应严格遵循原文的字面意思，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与文化背景，在文化传递方面，他注重倾向于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直译，并添加详细的注释，解释其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瑞典语言学家、汉学家高本汉的翻译理念核心是主张翻译应基于严格的语言学考证，准确传达原文的语言形式与意思。基于两者统一的翻译理念，理雅各和高本汉都采用了偏“异化”的翻译策略，将“蒹葭”翻译为“reeds and rushes” (rushes 通常指灯心草)，将“蒹”译为灯心草，“葭”译为芦苇，试图区分“蒹”与“葭”的不同，但在英语文化中，灯心草与芦苇是两种不同的植物，这种保留原诗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虽会分散诗中“蒹葭”这一植物意象，增加西方读者理解难度，但这契合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强调的异化策略意义，即打破目的语常规，凸显源语文化差异，利于传播《诗经》植物意象承载的深厚中国文化[13]。然而，异化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读者理解难度的增加。对此，译者可采取多种应对方法：一是标注简洁且重点突出的注释，帮助读者快速抓取关键信息；二是运用图片、插画等直观展示植物形态特征，帮助读者建立形象认知；三是在译文排版设计上，通过不同字体、颜色或添加提示符号引导读者关注、理解文化注释内容。如部分大众《诗经》译本将植物意象注释置于页脚或侧边栏，便于读者对照查看以降低理解难度。

### 3.2.2. 归化策略

在以上翻译学者中，英国汉学家、翻译家亚瑟·韦利强调译文可读性与文化适应性的翻译观念，主张翻译应注重译文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性，使译文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艺术魅力，而不仅仅是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这与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所提及的理念不谋而合，即有效的交际不单单来自语言成份，因为在更广阔背景下，没有任何两种语言能够完全反映同一现实[19]，亚瑟·韦利始终认为翻译需要让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自然流畅，将中国文化中的意象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意象，帮助读者毫无障碍地领略原文所传达的美感与意境。因此，在翻译“蒹葭”时，他较多地运用归化策略，以“the rush leaves” (灯心草的叶子)替换，借西方熟悉意象代原诗意象，并采用复数形式，此处的复数形式准确地译出原文“蒹葭”浓密茂盛的生长态势。而在译诗的形式上，他明确表示译诗和原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差别很明显，原诗诗行末尾押韵，而译诗只是偶尔有押韵，并强调自己的译诗更像英美民歌，诗节形式不规律，且四行与六行杂乱分布[20]。这种常用的归化策略虽因贴近英语表达习惯，降低了读者的理解门槛，提高了跨文化的传播效果，却忽略了“蒹葭”作为芦苇的核心特征与源语的异质文化内涵，致译文与原意象有语义、内涵差异，削弱其文学与思想价值，造成归化过度，增加了读者体悟原诗韵味的难度[21]。因此，为尽量兼顾意象原有的文化精髓，译者在运用归化策略时要慎选替代意象，深入对比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中植物意象的异同，寻找那些在文化内涵上最为接近的对应物。同时，可以通过添加少量注释或者在译文中巧妙融入一些相关文化背景信息的方式，对原意象的独特文化内涵进行补充说明，帮助读者在理解译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领略到原意象所承载的独特文化韵味。

### 3.2.3. 融合策略

在跨文化交流中，《诗经》植物意象翻译需兼顾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不可偏废，既要保留独特意象吸引译入语读者探究源语文化，又要顾及目标语读者接受能力，以防信息传递有误。译者需秉持不同语言文化“和而不同”原则，在实现与世界沟通对接时，避免抹除源语和译入语语言文化差异[22]。因此，综合运用异化与归化策略尤为必要，如此可在确保译文可读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传递植物意象的文化与审美价值，助力《诗经》跨文化传播。如采用通用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蒹葭”。通过对“蒹葭”的形态、

颜色、生长环境等特征进行通用的描述性翻译,使译文读者能够在不了解“蒹葭”这一中国文化意象的情况下,也能大致想象出诗中的场景,杨宪益、戴乃迭与汪榕培的翻译在上述五种不同英译本中最能体现这种融合策略,在翻译《诗经》中的《蒹葭》时,对于“蒹葭”这一植物意象的处理,他们采用了一种兼顾文化传播与读者理解的平衡策略。杨宪益与戴乃迭主张翻译应准确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文化内涵与艺术风格,不随意增减或改变原文的意思,既注重忠实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又倾向于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直译,并适当添加注释,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因此,他们将“蒹葭”翻译为“the reeds”,运用复数形式“reeds”,增加对植物意象的形态描写来体现河边芦苇丛生的繁茂景象,这既贴合原诗中所描绘的“蒹葭苍苍”那种芦苇众多、绵延成片的画面感,又能让西方读者通过熟悉的英语词汇去想象诗中的自然场景。汪榕培认为,翻译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还要传递原文的神韵与情感,使译文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文的艺术魅力,因此,他将“蒹葭”翻译为“green reeds”时,运用了一种既贴近原文意象又注重文化传递的策略:“green”一词的添加,增加对本文核心意象的颜色描写,不仅直观地描绘出芦苇生机勃勃的视觉形象,契合中国人对这首诗所营造的自然意境的审美认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具象化的表达,将原诗中“蒹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使译文既符合中国现代读者基于本土文化视角对古老诗歌的理解与文化认同,也便于在跨文化传播中向世界展示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韵味。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该翻译策略翻译《诗经》其他含植物意象诗歌时,译者应依具体意象特点及受众情况,字词层面用归化处理保证理解,注释或前言中异化介绍文化内涵,平衡原始韵味与读者接受习惯;译文整体风格和结构上也可采用融合策略,在保证语言流畅基础上,模仿原诗韵律节奏保留《诗经》的艺术特色,灵活运用两种策略传达原诗文化精髓。

#### 4. 结论

通过对《蒹葭》核心植物意象“蒹葭”多译本对比可以发现,《诗经》植物意象并非普通景物指称,而是情景交融、文化积淀、多义模糊的复合符号,其意义生成深度依托中国农耕文化、礼乐传统与诗性思维,这也使其跨文化翻译呈现出显著的文本特异性与实践复杂性。对比显示,七位译者在处理“蒹葭”名称时策略分化显著(异化、归化、融合),但在处理“苍苍”“萋萋”“采采”等形态修饰词时却不约而同采用颜色词或状态词进行趋同翻译,这表明植物意象的“名称层”(文化负载最重)与“修饰层”(审美感知为主)可在翻译中被策略性剥离:前者承担文化传递功能,策略选择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立场;后者承担氛围渲染功能,跨文化通约性较强,因而处理方式高度一致,这种“分层处理”模式比笼统的“融合策略”更具操作指导性。另外,韦利的归化译本在普通读者中接受度最高,理雅各的异化译本在学术研究中价值突出,汪榕培的融合译本则在文化传递与审美可及性之间取得平衡,这说明《诗经》植物意象的翻译不存在普适的“最优策略”,翻译原则也应“文本中心”转向“读者中心”[23],根据目标受众(大众读者、学术研究、文化传播)选择不同的传播轨道。但是,《诗经》植物意象翻译的核心问题,并非泛泛而论的“文化与读者兼顾”,而是如何在保留植物本体意象、尊重重章叠句韵律、传递起兴意境三者之间实现精准适配。相较于通用的“读者中心”原则,面向蒹葭这类水生、季节性、起兴型植物意象,更适宜采用“本体锚定+意境补偿+轻量注释”的融合模式:以植物通用指称锚定核心物象,以形态、色彩、复数等手段还原场景氛围,以极简注释提示文化功能,在不破坏诗行节奏的前提下实现文化可感、读者可及、诗性可传。最后,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聚焦于“蒹葭”这一植物意象在许渊冲、汪榕培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等六个译本中的对比,未能涵盖更多不同译者和风格的译本。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更多风格的译本和更多《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同时结合跨文化传播的实际案例和读者反馈(如西方读者对不同译本的理解程度与接受偏好),实施实证研究,深入探讨更有效的翻译策略,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 参考文献

- [1] 秦阳. “菊”意象与中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延安: 延安大学, 2020.
- [2] 李娟. 中国古代意象在《诗经》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J]. 语文建设, 2016(27): 65-66.
- [3] 王宏. 《诗经》及其英译[J]. 东方翻译, 2012(6): 50-57.
- [4] 李玉良, 庞德. 《诗经》翻译中译古喻今的“现实”原则与意象主义诗学[J]. 外语教学, 2009, 30(3): 90-94.
- [5] 徐茜源, 尹明明. 许渊冲《诗经》英译本中的民俗文化翻译美学研究[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27(1): 57-63.
- [6] 高远, 李崇月.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诗经》许渊冲译本中的译者行为研究[J]. 英语广场, 2025(35): 7-11.
- [7] 胡作友, 冯悦. 翻译中的诗学与译者主体性[J].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23(1): 77-85.
- [8] 王平, 著. 文学翻译意象论[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 [9] 屈光.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162-171, 208.
- [10] 石明鞠. 基于植物意象的高中古诗阅读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鞍山: 鞍山师范学院, 2023.
- [11] 廖七一, 编著.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2] Lefevere, A. and Bassnett, S.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21832/9781800417892>
- [13] Venuti, L. (2017)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098746>
- [14] 周振甫, 译注. 诗经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5] 祝敏彻, 赵浚, 刘成德, 张文轩, 侯兰生, 郭芹纳, 译注. 诗经译注[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 [16] 柯继红. 中国诗歌形式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1.
- [17] 许亚敏.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J]. 黑河学刊, 2017(6): 59-61.
- [18] 张智中. 谈许渊冲翻译实践与理论: 贡献与局限[J]. 中国翻译, 2022, 43(4): 92-97.
- [19] 尤金 A. 奈达, 严久生. 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汉英双语版)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 [20] Arthur, W. (1937) *Translator the Book of Songs: Shi Jin*. Grove Press.
- [21] 邱能生, 邱晓琴. 文化差异背景下英汉习语翻译的异化和归化处理探微[J]. 上海翻译, 2019(1): 51-56, 95.
- [22] 范武邱.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语言硬伤依然存在——写在莫言获奖之后[J]. 当代外语研究, 2013(4): 38-41, 78.
- [23] 陈庆. “重译”案、目标读者与爱情的教诲——以李金发翻译诗集《古希腊恋歌》为中心[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4(1): 71-80.